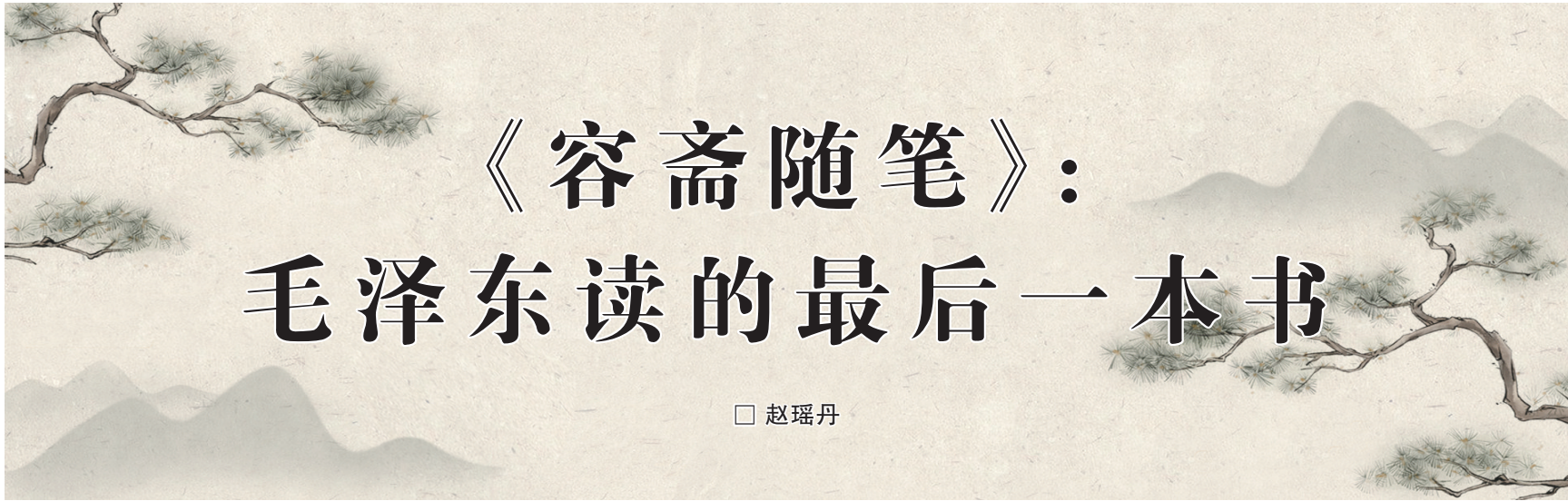




□ 赵瑶丹

《容斋随笔》是毛泽东精神生活中的一位老友。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曾致函谢觉哉：“《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之后，谢觉哉在同年9月、10月的日记中留下多篇阅读《容斋随笔》的心得与应用记录。1959年10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亦携带《容斋随笔》。1972年，曾将此书送给同学周世钊。其中张元“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豪迈诗句，受其大加赞赏。毛泽东去世前要的最后一本书还是《容斋随笔》（以下简称《随笔》），这部伴随毛泽东走完了人生最后旅程的书，究竟蕴含怎样的智慧与魅力呢？

（一）

《随笔》是南宋洪迈所著的一部史料笔记，与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并称，被视为宋代最有学术价值的三部笔记。《随笔》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从两宋300多部存世笔记中脱颖而出，成为翘楚。

《随笔》是洪迈一生的读书所得，是洪迈以哲理的思考、诗人的笔触、史学的严谨铸就的一部经典。洪迈自述：“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该笔记所叙，看上去杂乱无章，实则言简意赅，妙语连珠，前后贯穿，伏脉千里，三言两语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

《随笔》是饱含爱国爱民情怀、崇尚气节与学问的洪迈，为后世留下的一部向统治者谈治国之道，为子孙后代立言立行的宏富之作。《容斋随笔》随着《容斋续笔》《容斋三笔》《容斋四笔》《容斋五笔》的刊刻，成为5种书的总称，共74卷。其中前四集各16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10卷。书成于宋孝宗淳熙庚子（1180年），刊刻在淳熙庚子至十四年（1187年）之间，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五笔合刊。《随笔》一经问世，引起强烈反响，历经宋元明清，

不断刊刻，广泛传播。南宋时期就有七个版本，元至明清出现十几个版本，这些年来，整理本层出不穷。《随笔》无论是内容涵盖还是版本流传，皆纵横古今，可谓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这部凝结洪迈对历史、社会的观察，充满为政、为学、为人智慧的史料笔记，对后人思考历史、反省自身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不仅有鉴古知今之益，且可为治国、治学、做人提供参照，不仅被史学、文学、语言、文献学各领域的学人奉为绝佳的研究对象，也深受广大民众喜爱，读者广泛、穿越古今、绵延不绝，影响至深至远。

《随笔》内容广博，记事丰富，议论精当，考证确切。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语言、文献等多方面。有对宋以前王朝兴废、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的记载，又有对宋代施政问题、贤臣能吏、奸相污吏的剖析；有对宋代典章制度、官场见闻、社会风尚、物产考察的记述，还有对名物去伪存真的考订，对史著的评介；既记述历史事实、政治风云、文坛轶话和掌故，亦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天文、历算、星相等诸多方面。该书不仅剖析历史，而且关注当下；不仅关注国家大事、精英人物，亦关注平民百姓，还有对世情民俗的评述与重视（录有民歌、民谣、民俗），展现了社会百态。书中有关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治乱兴衰、智谋韬略、官场见闻等方面的议论颇为精辟，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其中补南唐五代史料180多条，具有独存、补史价值，部分内容可补《资治通鉴》之不足。

（二）

《随笔》突出体现了洪迈的“苍生之念”。书中收录唐人张碧《农父》诗：“运锄耕斲侵星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田翁》诗：“白发星星筋力衰，种田犹自伴孙儿。苗苗若不

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读二人诗作，洪迈深感悲伤酸楚之余，感慨南宋农民的惨状比唐代更甚几倍。

《随笔》把爱民情怀作为择选诗作的标准，还将是否爱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是非高下的重要原则。通过记述典型事例，塑造了以民为本、忠义为本、建言献策和公正廉贤等多种贤臣形象，夹叙夹议地突出贤臣的品德和才能。

《随笔》除了热情颂扬历史上清正廉洁、恤民爱民的明君贤臣，还大力挾发历史上有争议人物的亲民善政之举，如曹操、朱温、张全义、孟昶等。宋太宗曾手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赠给郡国，下令立于官属之南，称作《戒石铭》。经洪迈考证，此铭出自后蜀孟昶颁发给各地的《颁令箴》。原文24句，宋太宗从中摘了4句，“遂成王言”。对此洪迈赞叹：“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

《随笔·张全义治洛》记叙了张全义（在唐末参加黄巢起义军，后降唐，续继后梁，再降后唐）恢复洛阳经济，施爱于民，大有政绩，并被百姓祭祀的史事。张全义治洛，招抚流民，劝民农桑，“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因“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对此，《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言之不详，洪迈则详细录入，并评论道：“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三笔·国家府库》《续笔·田租轻重》，分别指出以钱折税的危害和百姓赋税沉重的原因。《五笔·风灾霜旱》强调，一旦出现灾情，朝廷应派贤良的地方官实行救助，如此“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五笔·贫富习常》，则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表达了深切同情，感叹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奴役关系，更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习以为常”而感到悲哀。

（三）

值得注意的是，《随笔》还展现了

不少女性形象，有对贤后妃的描述，《随笔·三女后之贤》彰表王莽女儿、杨坚女儿、李昇女儿的深明大义。《续笔·妇人英烈》记述了几位有高德巍行的妇女，“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续笔·女子夜绩》则展现了勤劳夜织的劳动妇女形象。另外，亦有对嫉妒女性的描写，《三笔·陈季常》呈现了陈季常妻子“柳氏绝凶妒”的形象，造就了“河东狮吼”的典故。

《随笔》关于洪迈的民本见解与思想，体现在对诗歌的择选，对历史事件的评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诸多方面。粗看片言只语、一事一议，细读却是见解精辟、益人心智。其以民为本的思想，铸就其高雅格调，卓然超越众多的同类著作，成为我国古代笔记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这部笔记，是短篇作品的集合，或思史实，或论事理，或议风土人情，或辩语言奥妙，文字简朴生动，资料甚富，寓天下事以正理。明代监察御史李瀚称赞道：“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摭拾典故，直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讠、卜、医，钩纂不遗。”《随笔》洋洋洒洒，裨闾千载，可劝人为善，可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增广见闻，可澄清谬误；可消除疑问，可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这部收纳历史经典碎片之作，微言大义、意味深长，以其简短精辟的语言，隽永的意蕴将笔记体史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历史文化

典籍



龙标书院：风开百代 二送红军

□ 汪霏霏



月，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北进，分南北两路进入贵州省黎平县。北路从丘团直插中黄，经新化、隆里到达鳌鱼嘴（今敖市镇）与南路红军会合。由于以往只要国民党军队经过，总是闹得鸡犬不宁，百姓遭殃。所以，隆里古城居民谈兵色变，加之国民党政府当时宣传把红军诬作土匪，导致隆里古城人民误信，听闻红军来了，全城老少跑到山上躲避，留下一座空城。红军一面以口头、标语和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一面派战士到田间唤回逃散群众，并

帮逃散者打完已割未打之谷。

据隆里古城年过九旬的王培义老人回忆，他的父亲心中隐约感觉红军是“好军”，所以当红军的一位排长和气地提出指路的请求时，父亲马上答应。贵州境内山高路险，荆棘丛生，行走十分艰难。茅草划破了手，乱石磨烂了脚，父亲一声不吭地领头带路，直到把红军部队送到10公里外的大路上才准备返回。当时已是冬天，晚上又冷又黑，红军留父亲吃了夜饭，排长特意送他一盏马灯，还送给他两块毛皮包脚取暖。有了明亮的马

隆里古城位于贵州省锦屏县西南边缘，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军事屯堡，素有“中原余音，南疆锦绣”之美称。隆里古城是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隆里古城因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古民居、古碑、古桥、古井等众多文物古迹而名扬中外，而龙标书院是隆里古城最古老的文物古迹，也是贵州历史最悠久的书院。走进隆里古城丁字街仰望龙标书院，唐代遗留下来的独特古建筑遗风让人流连忘返。走上龙标书院的鹏程桥，犹如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了远古的唐代，此时书院里传来学子们吟诵《三字经》的琅琅书声，犹如看见“诗家天子”唐代进士王昌龄在给学子们传道授业的一幕幕……

王昌龄与龙标书院

相传天宝七年（748年），唐代诗人王昌龄因写《梨花赋》遭人中伤，被朝廷贬谪至此。龙标地处偏远，常被误认为险山恶水出刁民，其实那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民风淳朴。各少数民族团结友爱，各部落友好往来，由于远离朝廷，所以边民并不把王昌龄看作一个有罪之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来自京城的朝廷命官，而且是满腹经纶的文化人，边民们都对他敬爱有加。王昌龄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上，他极力把优秀的汉族文化传播到这块极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土地上。他创办龙标书院，传教授学，开化风俗。在王昌龄的影响下，龙标各少数民族部落开始学习使用汉字，逐渐能用汉语交流。作为龙标县尉，王昌龄狠抓社会治安管理，一边教化民众，一边赏罚

分明，一时间龙标城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外，王昌龄还改变了龙标原始的劳作方式，指导各少数民族群众用牛耕田、兴修水利、开荒造田，扩大农业生产。在任期间，由于王昌龄传教授学、变革民风颇有德行，与龙标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地人称其为“状元”。据《开泰县志》记载：“隆里之有龙标书院，创建自唐王昌龄公”。今天，锦屏隆里还有龙标书院、王昌龄祠、状元桥、碑文、状元墓等纪念王昌龄的历史文化遗迹。而后人纪念王昌龄在龙标的诗词更是数目繁多，仅黎平府人士留下来的纪念诗词就多达200余首，并有《剑劈石》《千年古柏》《王昌龄夜遇芙蓉仙》等传说。

由于战乱，明代时龙标书院仅存遗址。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依旧址修建。清顺治六年（1649年）地方战乱，书院再次被毁。清雍正三年（1725年），鸿胪寺少卿告官归里重建龙标书院。雍正年间龙标书院号称黎府八大书院之榜首，足见它在当时黎平府所处的地位及作用。

一送红军

1934年秋冬时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经过隆里古城。1934年9

月，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北进，分南北两路进入贵州省黎平县。北路从丘团直插中黄，经新化、隆里到达鳌鱼嘴（今敖市镇）与南路红军会合。由于以往只要国民党军队经过，总是闹得鸡犬不宁，百姓遭殃。所以，隆里古城居民谈兵色变，加之国民党政府当时宣传把红军诬作土匪，导致隆里古城人民误信，听闻红军来了，全城老少跑到山上躲避，留下一座空城。红军一面以口头、标语和传单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一面派战士到田间唤回逃散群众，并

帮逃散者打完已割未打之谷。

据隆里古城年过九旬的王培义老人回忆，他的父亲心中隐约感觉红军是“好军”，所以当红军的一位排长和气地提出指路的请求时，父亲马上答应。贵州境内山高路险，荆棘丛生，行走十分艰难。茅草划破了手，乱石磨烂了脚，父亲一声不吭地领头带路，直到把红军部队送到10公里外的大路上才准备返回。当时已是冬天，晚上又冷又黑，红军留父亲吃了夜饭，排长特意送他一盏马灯，还送给他两块毛皮包脚取暖。有了明亮的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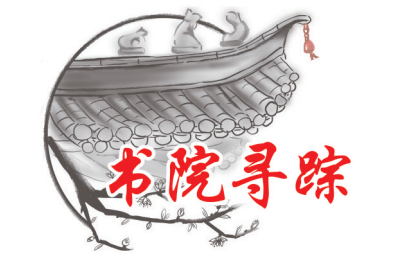
二送红军

1934年12月，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从湖南靖县、新厂往马路口进入黎平中黄后，分路的另一部分经新化到隆里宿营。这次中央红军到来后，隆里人民不但没跑，得知消息的群众反而沿隆里古城三街六巷挨家挨户通知“红军来了、红军来了……”继而通过城内德高望重的老人发动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挥动写有“欢迎”的三角小旗，到城门外欢迎红军。地方上的开明绅士也纷纷出门欢迎。红军在隆里古城宿营期间，帮群众医病、舂米、打扫街道庭院，还留下了很多标语，群众则主动挨家挨户筹集柴草粮食供应红军。红军在龙标书院门前搭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 and 北上抗日等革命主张，晚上与古城汉戏班子联谊演出。红军走时，全城老百姓送出北门，取道状元

桥往婆洞方向前进。这两次红军经过隆里时，一路上散传单、写标语、搭台演戏，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撒下革命星星之火。

龙标书院外，石板路上，红军队伍的足迹已无处寻访；古巷道中，人呼马嘶的声音也早已消失。然而，二送红军的故事，一盏斑驳的马灯，再次勾起人们对陈年往事的回忆。红军长征时期，所经之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那匆匆而过的身影，尽管发生在87年前，却让隆里人民久久不能忘却。对于长征的精神和意义，毛泽东是这样总结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书院立，书声起，历经千年，几经治乱，几度焚毁，几次修复，龙标书院始终屹立不倒。历朝历代，从书院走出莘莘学子。他们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有的跻身庙堂经世济民，有的栖身市井传道授业，同为中华文明的新火相传贡献智慧和力量。一座龙标书院，使隆里人文蔚起，风开百代，而龙标书院也见证了隆里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对革命胜利的强烈期盼。



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

□ 孙本良



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生活在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年代。孔子私学的兴起，正是在这一变革时期发展起来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孔子的政治思想，讲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义。其理论根据，是发现了“仁”的普遍性存在。而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在于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可能性。

在孔子看来，“学”是方法，通过“仁”成为“君子”，可以出仕，也可以不出仕。《论语》说：“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是“不器”的。孔子的教育目的，虽然是要培养“治国”的人才，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人格的修养上。正如他所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诸语，他是把学习的目的扩大了。

“因材施教”“以身作则”是孔子教学上的两大原则。因材施教就是从实际出发。《学记》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又说：“夫子以身教，不专以言教”。故温故知新，可以为师；记问博习，无与于师道也。均说明孔子的教学方法，以重视学生自己的思考活动为主，成为其鲜明的特点之一。在启发过程中，教师应善于提出问题，帮助学生思考，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反问教师。反复辩论，道理至明。孔子发现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虚心好问的精神，是学好的基础。如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作为“以德服人”的教育家，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典范，他倡导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